



我们为什么疏离了经典？

《中国科学报》：你多次在两会上有提案希望推动全民阅读，现在在推动经典阅读，这些应该都是基于国民阅读现状提出的吧？

詹福瑞：是的，作为个人以及作为过去的职务工作，我看到了我国国民阅读存在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我们有很好的读书风气。但是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风气开始发生变化。

一方面阅读率下降。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率调查，最早在1999年，那时阅读率在60.4%左右，之后就持续下滑，到2005年曾跌破50%，现在阅读率有回升。但还是有一部分人不阅读，特别是不读纸本书。

另一方面是读书呈现泛阅读的倾向。我们越来越受大众文化的影响，所谓泛阅读，一个主要表现是越来越疏离经典。

《中国科学报》：大众文化的流行会给阅读经典带来什么影响？

詹福瑞：大众文化是西方在上世纪30年代提出的，很多学派对大众文化有定义和研究。我认为大众文化有三个基本特点。

首先，以现代传媒为载体和传播手段，把文化变成商品，甚至把理论变成商品。因为商品就要遵循市场的规律，而市场是一种平均水平，以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打比方，市场基本是下里巴人的水平。因为要是做阳春白雪，收视率会很低，点击率会很低。

其次，大众文化以娱乐为主，供人消遣。第三，与艺术的本质是创新、创意不同，大众文化本质在于复制、拷贝。

所以从这些特点可以看出，大众文化跟经典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经典文化对现实采取一种有距离的、批判的态度，而经典阅读也不是以娱乐为主的阅读。

《中国科学报》：记得201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曾发布了“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的前十名，这十本书包括《红楼梦》《瓦尔登湖》《百年孤独》等等。是不是因为经典太批判，不娱乐，所以也不好读？

詹福瑞：经典读起来在思想上是比较沉重的，但还不是我们疏离经典的主要原因。我认为疏离经典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大众文化流行，都在追求快乐阅读；二是我们的阅读能力在下降，理解力、判断力在下降。轻松的、愉悦的、碎片化的阅读，不能培养我们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另外，现在是读图时代，图像阅读也会消减我们的想象力。大众文化流行的后果，使我们失去读经典的能力。

阅读分享

作为一名陕西延川人，厚夫从不拒绝把自己和“路遥”两个字紧紧相连。他是《路遥传》的作者，路遥文学馆馆长，从年少时就受到路遥事迹的引导，“用心来遥望路遥”。他曾因电影《人生》在延川拍摄，骑几十里路的单车去看高加林和刘巧珍“谈恋爱”，路遥也曾为他写推荐信，努力促成他到延安大学任教。“感动无处不在，感激铭记心间。”在《路遥传》一书的开篇序言，厚夫这样形容他对路遥的感情。

4月10日，厚夫来到中国科学报社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善思读书会”，与读者分享他眼中的路遥与《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的幕后

《平凡的世界》是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最被读者热捧的一部，许多读者对它都再熟悉不过。即使没有通读小说，也总会听到孙少平或是田晓霞的名字有所耳闻。然而，人们对其幕后的创作过程，却知之寥寥。在厚夫看来，创作像《平凡的世界》这样百万字的长篇多卷小说，不仅需要才华，也需要坚持。更何况，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之时，其小说《人生》已获得巨大成功，在全国引起热烈讨论，连路遥自己都清楚，《人生》是他自己难以逾越的横杆。在这时候开始新一轮创作，“是一位作家胆识与意志力的综合体现”。

“路遥设定这部小说的基本框架是三部、六卷、一百万字。”厚夫介绍路遥的最初构想时说，“作品的时间跨度从1975年初到1985年初，力求全景式反映中国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

在如此宏大计划的指引下，路遥在前期准备阶段就花费了近三年的时间。从未有过长篇小说创作经验的他，为了学习长篇小说的结构，“潜心阅读了100多部长篇小说，分析作品结构，玩味作家的匠心，确立自己的小说大纲”，同时为了扩充知识储备，“阅读

詹福瑞：读书要读经典

■兰雪滢 本报记者 李芸

在第20个“世界读书日”前夕，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了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0%，较2013年的57.8%上升0.2个百分点（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58.1%，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8.6%）。随着近些年政府、学者、出版机构等对阅读的倡

导，国民阅读率明显上升，但好读书，更要读好书。在国家图书馆原馆长詹福瑞看来，读书要亲近经典，读经典对个人、国家、民族的精神成长至关重要。

近些年詹福瑞围绕“为什么要读经典”这一论题著书立说，这本25万字的著作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面世。

经典是怎样炼成的？

《中国科学报》：什么样的书能称之为经典呢？

詹福瑞：何谓经典，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上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关于经典有一个大讨论，甚至称为“文化战争”，有一派是反对传统经典的，叫“废典派”，有一派是拥护传统经典的。这个讨论主要是对传统经典的讨论，认为传统经典带有权力的影子，是建构起来的，不是自然形成的。譬如西方现代出版家在审视经典时发现一个现象，在传统经典里面，很少有女性，非白人作家，很少有下层作家。

我国文学界也有对经典的讨论，主要是谁是经典作家的问题。我们提到现代文学经典作家一般说有六位，鲁郭茅巴老曹。但是1994年，学者王一川重排“大师文学榜”，在小说里面茅盾落选，诗歌里面郭沫若排到第八位。1995年，学者钱理群在《彩色文学史》里写了个前言，他说王一川是纯粹以审美眼光来重排“大师文学榜”，他自己除了用审美眼光，还用现实和超越的眼光来选，选了六位，这六位里面，不但茅盾落选，郭沫若落选，连巴金都落选了。

我国关于经典的讨论主要分成两派，一派是本质派，一派是建构派。本质派认为，经典本身是文本要经典。但是另一派认为好书还要读者看，认为经典是在传播过程中建构起来的。

《中国科学报》：那么你的观点呢？

詹福瑞：我基本属于调和派。经典首先取决于文本，但同时传播过程中也非常重要。

经典阅读如何推动？

《中国科学报》：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

詹福瑞：这个问题如果你认识到什么是经典，就可以完全解答了。

读经典对人精神的成长至为重要，对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建构也至为重要。一个人成长到18岁，生理上是成熟了，但是一个人的精神永远都不能说成熟了。在这个成长过程中，有的人会精神丰满，有的人却很贫瘠。这些决定于什么？决定于读书多少，也决定于读什么样的书，是不是接受了更多有营养的书。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应该如何推动经典阅读？

詹福瑞：从根本上还是教育问题。这些年的教育，有“去经典化”的倾向。中小学教材里面鲁迅的作品一撤再撤，去年9月还有古诗

词撤出与恢复的事件等等。当然，对经典的判断、评论主要靠学者，是少数人的事情。教育则是推动经典阅读的最重要力量。

《中国科学报》：现在一些电视节目，各种讲坛也在讲经典，你怎样看待这种方式？

詹福瑞：从传播的角度来讲，大众传播确实会削弱经典的高度。比如于丹讲《庄子》《论语》，就把经典的高度削平了，庄子本是搏击九天的大鹏，于丹把他降低为强七尺之逼的麻雀。这是为了迁就大众，这种降低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大众传播。

至于互联网，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经典的权威性更受到很大挑战。但是大众传播的作用在于引起读者的兴

趣，之后就要靠读者自己去读原著。大众传播还是有助于推动经典阅读的。比如，《论语》现在是畅销书，原本是不可能的。王蒙的《天下归仁》，上了畅销书榜。经典传播，更广泛的传播，还是要靠媒体。

《中国科学报》：每年我们会有各种图书评奖，基本范围是针对近些年的图书，不会评出版时间太长的书，这种评奖是不是就评不出经典？

詹福瑞：这些评奖恰恰是经典化的过程。好书不断被各种奖项评出来，说明不断得到权威学者和读者的认可，时间沉淀会逐渐形成集体共识。但是这个过程不是评奖就能决定，这是经典化的一个阶段。

《中国科学报》：你基本属于调和派。经典首先取决于文本，但同时传播过程中也非常重要。

《中国科学报》：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

詹福瑞：这个问题如果你认识到什么是经典，就可以完全解答了。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应该如何推动经典阅读？

詹福瑞：从根本上还是教育问题。这些年的教育，有“去经典化”的倾向。中小学教材里面鲁迅的作品一撤再撤，去年9月还有古诗

厚夫谈《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的精神世界

■兰雪滢



厚夫，本名梁向阳。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延安市作家协会主席，路遥文学馆馆长。著有《走过陕北》《行走的风景》《路遥传》等，曾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表彰奖、柳青文学奖、冰心散文奖等多项文学奖项。

今天为什么还要读路遥

近日，随着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热播，路遥与《平凡的世界》又一次成为社会热词。

“路遥热”的出现并不突然，而是长久积累的结果。在厚夫看来，路遥是我国当代文学中为数不多的“畅销书”作家。其代表作《平凡的世界》在新浪网2008年进行的“读者最喜爱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调查中，以71.46%的比例高居榜首。2012年进行的“文明中国”全民阅读调查中，《平凡的世界》荣获2012年读者最想读的图书第二名。

在年轻人聚集的高校中，《平凡的世界》也广受欢迎。厚夫说，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曾告诉他，《平凡的世界》曾连续三年在该校图书馆借阅率位居前三名，有两年是第一。

能量的东西，它善于把苦难转化成自己前进的动力。”厚夫说，“中国人写苦难小说多了去了，但是能够像路遥把苦难转化成前进动力的不多。”

“我们现在还要读路遥、读《平凡的世界》，是因为他写的是人性和人之间的温情，父子情、兄弟情、同事情，写得非常温暖。”厚夫说，“《平凡的世界》并不是简单的心灵鸡汤，而是继承着传统的精神内核，路遥提供给我们的是精神能量，正好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东西。人性和人之间应该有温情，应该相互搀扶，我认为这才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价值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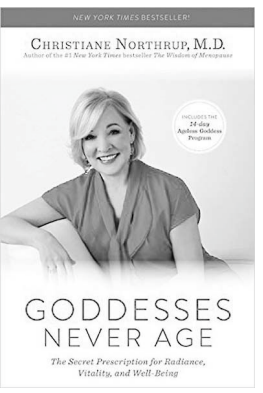
4月10日，《南渡北归》作者岳南、诗人王久辛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善思读书会”，两位学者也谈到了自己眼中的“路遥与《平凡的世界》”。

岳南：我的《南渡北归》写的是民国知识分子，那个年代面临的是国家处于山河破碎的阶段，表现的是对抗外来侵略的精神。而路遥《平凡的世界》里面写的是新中国建成之后的苦难。在路遥小说中主人公所处的年代，与民国时期国家破败的残酷背景不一样，但也有自己的残酷性。至于哪个更残酷，哪个更自由，哪个更有选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王久辛：在路遥的小说中，人与人之间，有算计，但还是好的战胜不好的。人与人之间是真诚的，互相帮助的。这种直面现实的情感交流，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活得幸福的很重要的支撑。我们常说作品要深刻，好像把人写得越坏就越深刻，像《甄嬛传》、《武媚娘传奇》一样。我真的是害怕，因为我不能拿《甄嬛传》去给我的孩子看，但是我可以拿《平凡的世界》《人生》去给我的孩子、子侄们看。因为很正能量，年青一代看了很给力。

域外书情

《女神永不老：容光焕发、生机勃勃和健康幸福的秘密配方》(“Goddesses Never Age: The Secret Prescription for Radiance, Vitality, and Well-Being”), 克里斯汀·诺斯拉普 (Christiane Northrup) 著, Hay House, Inc 2015年2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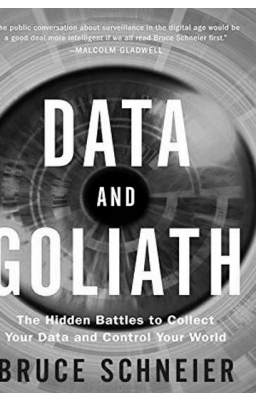


尽管我们经常说，希望自己“优雅变老”。但事实是，当我们真的变老，我们却必然惧怕这无可抵挡的衰老：我们的身体在衰老，容貌在衰老，两性关系在无可救药地变得脆弱不堪，甚至我们的生活中的快乐愉悦也在逐渐逝去。但是，克里斯汀·诺斯拉普医生在书中却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与灵魂在衰老过程中可以有另外一种不同的体验。

作者在她的研究中用自己的故事和实践练习提出抗衰老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拒绝食用加工食品和释放压抑的情感，大胆地享受情感快乐，与精神的源泉进行紧密交融。她认为我们的信仰和精神活动对于健康的价值和作用远超过生理学意义。她说，将注意力从“不断变老”这种意识中转移，而专注于今后的生活中的企图，我们应该坚持做到：充满活力的健康生活；令人满意的性生活；清醒的爱能力；轻松而愉悦的行动的能力；人际关系中的透明度与可靠性，尤其是与自己直接相关的人的关系。

作者将这些秘诀归纳为14天“抗衰老女神计划”。作者是纽约州医学中心的临床副教授，《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她鼓励女性在生命的任何一个阶段都要积极生活。

《数据与巨人：收集你的数据和控制你的世界的隐形战斗》(“Data and Goliath: The Hidden Battles to Collect Your Data and Control Your World”), 布鲁斯·斯奈尔 (Bruce Schneier) 著, W. Norton & Company 2015年3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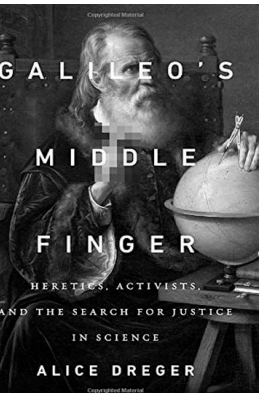
你的手机供应商一直在跟踪你的行踪，同时也知道你与谁在一起。你在线或者在商店购物模式一直被记录着，这些信息透露了你是否被解雇、生病、或者怀孕。你的电子信箱暴露了你的闺蜜和普通朋友的所有信息。Facebook能够确认你的性格倾向，尽管你从没透露。他们不仅仅存储信息，而且通过信息和收集的数据获得更多关于你的秘密，而这些秘密甚至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商业公司使用监督获得的数据不仅能够操纵发布新闻和广告，使你随时能够看到，而且及时提供你喜欢的商品价格。政府利用网络监视你的行为，检查你的信件，监察你的言论，也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使你陷入危险境地。商家和政府共享这些信息，甚至更糟糕的是，他们将巨量数据透漏给网络犯罪分子。

这些所作所为完全自愿：我们与公司共享网络监督系统，因为系统能够为我们提供方便。我们给政府提供信息，因为政府承诺给我们提供保护。这个结果就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大众监督社会。但是，我们丢失的比我们获得的更多吗？在这本《数据与巨人》中，安全专家布鲁斯·斯奈尔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安全与隐私的方法。他告诉我们如何做才能修改政府监视程序以及彻底改变建立在监视系统之上的商业模式，与此同时，还告诉你保护隐私的秘诀。你再也不需要用仅仅采用一种同样的方法检查你的电话、电脑、信用卡或者汽车。

布鲁斯·斯奈尔是国际知名安全技术专家，《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杂志称其为“安全大咖”。他撰写过12本书，其中包括《数据与巨人：收集你的数据和控制你的世界的隐形战斗》以及数以百计的文章、短文以及学术论文。

《伽利略的中指：异教徒、活动家以及科学正义的探索者》(“Galileo's Middle Finger: Heretics, Activists, and the Search for Justice in Science”), 爱丽丝·德雷格 (Alice Dreger) 著, Penguin Press 2015年3月出版



《伽利略的中指：异教徒、活动家以及科学正义的探索者》是一部维护知识分子自由和描写知识分子责任感的好书。这本书里科学论战中的真实故事，令美国眼界大开。

历史学家爱丽丝·德雷格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过着执着追求真理的生活。这种生活既有活动家的献身精神，也有成为不道德医学研究的牺牲品的危险。

德雷格用自己对于“双性人”(曾被称为双性畸形人)的待遇研究入手，揭露了这段具有启示意义的医学伦理学历史。作者在开始调查“双性人”用“正常化”为名而进行医学和人格虐待时，意识到美国医学问题的严重性，她开始记录所有的调查结果和事实，成为了国际知名的患者权利活动家。但是，即使今天双性人运动取得胜利，作者还是发现一些激进活动家利用谎言和个人攻击来压制科学家，使科学家们不能公开这些令人不安的事实与数据。在调查个案时，德雷格成为这种攻击的目标。

德雷格在美国各地奔走，搜寻各种争议后面的真相。在书中，作者描写了自己在肩负社会责任感和探求证据过程中漫长而痛苦的经历。最后，她在正义与真理的交织中取得成功，同时，她也意识到，学者和记者的责任对于脆弱的民主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普利策获奖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的著名作家贾雷德·戴蒙德评价道：“爱丽丝·德雷格会因为这本最扣人心弦的书而在今年获奖。但是，与其他书的不同之处是：她写的所有故事都是真实的，而不是一本虚构小说。相反，这是一部复杂关于好人和坏人的令人激动的真实记录，同时也是一本追求真理的好书。”

栏目主持：李大光